

孙强 ◆ 著

晚明商业资本的 筹集方式、经营机制 及信用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Raising, Management and Credit
Relationship of Commercial Capital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
及信用关系研究

A Study of the Raising, Management and Credit Relationship
of Commercial Capital during the Late Ming Period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研究/
孙强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7.7
ISBN 978-7-5601-3562-5

I. 晚… II. 孙… III. 商业资本—研究—中国—明代
IV. F72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21323号

书 名: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研究

编著者: 孙 强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矫 正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875

字数: 187 千字

ISBN 978-7-5601-3562-5

封面设计: 孙 群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 册

总定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421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jlup.jlu.edu.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序

国内外学术界对于明清时代商人和商业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丰厚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选择这个领域的问题来研究,等于是给自己出了一个难题。孙强副教授不辞其难,经过数年的研究,完成了《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研究》这样一本脉络清晰,文献扎实,多有新见的著作,是让人欣喜的。

明清经济史的研究,曾经在其结局问题上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普遍地假定“封建社会”的后期会发生趋于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过程,而中国既然终于没有自发地形成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没有令人满意的方式来描述和解释这样的一个过程及其结果。我把这种遇到困境的研究方式称作“封建社会解体障碍模式”。这种过分夸大社会变迁模式一致性的预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松动,后来因应海内外学术交流的增多,出现了另外一些富有启发意义的批评性假说。这类假说的学术价值毋庸置疑,但它们常常带着一个老问题,即仍旧是从某种理论预设出发,通过复杂的逻辑推论建构起结论来。明清时期的历史

文献,在这类学说中,很大程度上成了证明理论的工具。这就落入了与先前的“封建社会解体障碍模式”相同的“理论先行”的陷阱。还有一些研究者采取了社会学或者人类学转向,逐一去研究区域社会的不地方经验。单独去看这种转向,无疑是很敏锐和明智的,它开辟了辽阔的研究课题和方法论空间。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转向看作明清史研究的根本出路,而只能将它看作一种视野的拓展。因为这种方式通常涉及将中国社会总体转变或者不转变以及如何转变这样的趋势性问题看作缺乏意义的问题的假设。在我看来,总体趋势的解释仍旧是对于今天人们的历史经验有巨大意义的知识,增进这种知识并非不可能。而且,正因为我们承认文化和社会变迁方式的多样性,我们自然也要知道地方经验有地方性的局限。孙强的研究,突破了“封建社会解体障碍模式”的旧规,没有时髦到套用流行的宏大假说,也不去追求关于地方经验的局部现象分析,而是力求澄清晚明商业资本如何存在和运行的理路。他采取的是一种朴素的方法论:不去纠缠什么没有发生以及为什么没有发生,而去梳理、分析和解释发生了什么。无论历史学被历史哲学家刻画得多么复杂和不可捉摸,它的本质特征和特殊价值就是最大限度地接近这样的目标。历史学不可能被任何其它学科所取代,就是因为它的实证特征和注重时空具体性与历时性关系的原。孙强的研究,当然有不足之处,但是他的方法论观念是可取的。

明清经济史的文献虽然汗牛充栋,但是一旦具体到很

具体的课题,就常常显得分散、支离和歧义了。孙强研究的不是一个依赖一两个文件去“解释”问题的“微观”案例,也不是记载很完备的国家活动,而是涉及广大空间的一种民间经济活动现象,所以文献记载既分散又无系统性。他不惮辛苦,不辞琐细,将有关晚明商业资本运作的资料分类整理,然后再去分析各类文献究竟能够说明哪些基本问题。在这样的文献基础上来分析问题,还是比较能够接近实际。随着文献工作的继续,有关这个问题的研究可以深入下去,不至于因为预设条件太多,是因为预设出了问题而被颠覆。

以往研究明清经济史,虽然也注意商业资本,但是对商业资本的运作关注并不很多。其原因可能在于商业资本有悠久的历史,其本身包含的社会经济组织方式变革意义不如工业产业资本明确。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的工业产业资本实际受商业资本的支配,它的前景,也受商业资本的制约。所以,不搞清楚商业资本本身,包括各类雇佣劳动关系等等在内的工业产业资本究竟能够如何影响这个社会体系是说不清楚的。商业资本本身也并不是一个完全从理论上被看透了课题。比如,通过人际纽带关系来进行商业资本运作不仅存在于古代社会,也存在于现代社会;依赖家族、地缘关系来支撑的商业信用和资本集中运作可能足以支持一个相当发达的商品经济体系。晚明商业资本的运作现象中,有了更多的资本集中即资本社会化的成分,这与更早时代的那些独资巨富不同,可以把普通的社会成员卷入

资本运作过程,其发展不仅为商品市场进一步发达提供条件,也会带来社会关系和组织方式的变化。所以,持续不懈地对商业资本进行细致深入的研究,对理解明清时代的社会形态有很深刻的意义。孙强的研究是有贡献于这种努力的。

孙强治学,一向思路清晰,文风也是朴实无华。他的成绩,都是勤奋所致。我虽曾为他的老师,但在自己的研究课题上用时多,对他的指导却并不具体,也不充分。现在他的著作出版,我的欣喜,是难以言述的。

赵轶峰

2007年6月30日

于东北师大史苑315室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意义	1
二、概念界定	6
(一)晚明	6
(二)晚明时代的商业资本和商人	9
三、研究基础与研究思路	11
(一)明清社会的发展问题	11
(二)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问题	14
(三)晚明商品经济因素的新发展	17
(四)前人成果与本书考察要点	23
四、资料说明	35
第二章 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方式	39
一、家庭筹资	40
(一)家庭筹资行为	41
(二)家庭投资商业的障碍问题	45
(三)小结	49
二、借贷融资	50
(一)商人借贷的途径	51

(二) 商业性借贷的利息率问题	65
(三) 商业性借贷的发展程度	80
(四) 小结	89
三、合伙集资	90
(一) 合伙集资的实现	92
(二) 家族合伙分析——以徽州商人为典型	97
(三) 合伙集资的类型: 普通合伙、有限合伙 ——以“附本”制度为重点的考察	105
(四) 合伙纠纷及其司法审判	111
(五) 小结	118
第三章 晚明商业资本的经营机制	119
一、亲身经营制	120
二、合伙经营制	121
(一) 共同出资、共同经营	122
(二) 共同出资、委托经营	123
(三) “附本”入伙、委托经营	125
(四) 单方出资、委托经营	125
(五) 小结	132
三、家族经营制——以徽州商人为典型的考察	133
(一) 家族式经营行为	134
(二) 家族式经营评价	142
四、雇佣经营制	145
(一) 受雇“掌计”	146
(二) 受雇“伙计”	152

(三) 受雇“主管”	157
(四) 受雇经营者的地位问题	159
(五) 雇佣经营制评价	167
五、 奴仆经营制	169
(一) 奴仆管店	170
(二) 奴仆贩运贸易	174
(三) 奴仆经营制评价	178
第四章 晚明商业信用	186
一、 牙行居间	187
(一) 居间信用的良性运转	189
(二) 居间信用的缺失	195
(三) 法律规定与居间活动的运转	200
(四) 居间纠纷的司法审判	203
(五) 居间信用的非制度化保障	209
(六) 小结	215
二、 赊卖赊买	216
(一) 消费性赊卖赊买	218
(二) 经营性赊卖赊买	223
(三) 经营性赊卖的风险问题	228
(四) 赊欠纠纷的司法审判	235
(五) 赊卖赊买的功能	241
(六) 小结	245
三、 商业汇兑——以“会票”为中心的考察	246
(一) 作为民间汇兑票据的“会票”	246

(二) 会票使用的初步考察	252
(三) 清初商用会票分析	258
(四) 小结	263
第五章 结论	265
一、本书结论	265
二、延展的讨论	271
(一) 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的弹性 及其对商业发展的容纳	272
(二) “重农抑商”的实质与商业发展的可能	278
(三) 法律框架下商业资本的发展空间	284
(四) 商业发展与明清社会的发展	288
参考文献	293
后记	304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视角与研究意义

晚明社会呈现出一些新的现象，可以将之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段。在这个时段，一方面，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依旧强有力地存在着，在某些方面甚至表现出强化的趋势；另一方面，社会经济领域的商品经济元素却空前活跃，呈现出非传统性的转变迹象。^①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互动的视角下观察，社会经济的商品化动向与专制政治体制的稳固或强化呈现为一种不和谐的现象。那么，这种“不和谐”的境况为什么是可能的？是否意味着晚明商品经济元素没有发展的出路？或者，这是否意味着明清社会经济没有发展？显然，如果想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考察和评估晚明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和潜在能力。可以说，这项考察事实上具有讨论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意义。

我们过去针对晚明时代的具有传统中国社会发展前景

① 关于这一点下文将有总体叙述。

意义的讨论多在“资本主义萌芽”的框架下进行，这种讨论在其特定的理论范式内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这个角度的考察注重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关系，对于商业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并不注重。

对于商业的发展在16至18世纪西欧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的作用，马克思曾作《交往和生产力》的专文进行考察和论述。在这篇专文里，马克思认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是西欧的生产力发展和生产方式转变的起点，强调贸易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在这一转变中起动因作用。^①

美国学者诺斯在从“制度”的“结构与变迁”的角度对西方世界的兴起和经济增长的考察中认为：“产业革命始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市场规模的扩大迫使人们用较好地确定的习惯法来约束企业家”，同时扩大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专业化导致考核投入和产出的交易费用的增加”，助长了对工人的监督以改善质量，引起工厂体制的变化，从而降低设计新技术的费用，最终加速了经济的增长。诺斯将产业革命看作“是以前一系列事件积累的结果”，而其起点和基础则是市场规模的扩大。^②

英国学者亚当·斯密提出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观点对于认识商业的发展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十分有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56—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② (美)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188—191、183页，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益。该观点认为：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是分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能力”，它“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而是“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因此，分工的程 度，取决于交换能力的大小，“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① 斯密提出的分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常被称为“斯密动力”。^② 显然，“斯密动力”所推动的经济增长，要受商业发展的限制，或言之，商业发展的程度制约“斯密动力”的大小，最终制约经济增长状况。^③

根据马克思、诺斯和斯密的考察与论述我们可以认为：贸易、市场、职业商人等商品经济因素的发展为西欧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和动因；商业的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

实际上，16~17世纪的中西社会都经历着商品经济的新发展，都具有职业商人阶层、贸易发展和市场扩大等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因。这一时期，西欧和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都处于这样的状态，即由“天赋要素”差异引发的贸易得到发展，导致市场的扩大，通过在商业交换中的比较优势，进一步促进了生产和交换等领域内的

① (英)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5—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② 吴承明：《中国的现代化：市场与社会》，1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1。

③ 事实上，在马克思和诺斯对西方社会的生产发展的考察和讨论中，也包含了商业和贸易的发展促进分工从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观点。

分工和专业化，从而产生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李伯重先生关于明清时期江南的“早期工业化”问题的一项研究也认为：地区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是推动江南“早期工业化”发展的主要动力，这种动力的大小和持续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市场的变化，主要通过贸易表现出来。^① 如果贸易和市场的扩大是明清社会经济增长的一种推动力，那么这种力量显然应归结为那一时期的商品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内驱力，并在商人和商业资本的发展中得到直接体现。

晚明时代的“十大商帮”实质上接近于自由的职业的商人阶层。商人的本性是在执行交换职能中谋利，这与商业资本的价值增殖功能是一致的。商业资本的职能使之有利于促进社会分工，并可以直接地开拓市场，促进贸易范围的扩大。况且，无论是现代社会还是传统社会，在市场和贸易活动中都有一个由资本价值增殖本性决定的成本与效益问题，商业资本的运营是市场和贸易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一个社会的商业资本的发展水平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同步的，并且是商品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同时，商业资本的运营在资本本身的范围内能够反映商业行为人与人之间及商业行为人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对它的考察于历史研究而言也能够体现关注经济与社会的关系的主旨。因此，本书以晚明商业资本为中心，通过对商业资本

^① 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年）》，533—538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的筹集方式、经营机制及信用关系的具体考察，勾勒晚明商业发展的一个侧面，期待于这一侧面上对更深地了解晚明商品经济因素的发展程度、潜力及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所助益。

本书的研究与以往关于“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均指向论证传统中国社会的发展。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其一，“资本主义萌芽”的模式一般暗含着传统中国社会也会发展为欧洲式的资本主义的判断倾向，因而旨在探讨传统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方向的发展。本书的研究是在商业发展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这一视野下，关注于商业资本运作中形成的方式、制度对促进社会经济及社会生活的变动与发展的意义，进而指向探讨传统中国社会以非西方资本主义方式发展的纹理。其二，“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以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为主题，注重考察传统中国社会的工场手工业、经营性农业及雇佣劳动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水平。本书的研究从晚明商业的繁荣这一现象出发，围绕着商业资本展开考察，具体考察晚明商业资本的筹集、经营和信用关系方面的运行实态，解释晚明商业资本为什么发展和怎样发展，认识商业资本和商业的发展潜力。

二、概念界定

(一) 晚明

以“晚明”来表述本书研究的历史时段不免给人以预设明代历史分期的印象，因为，所谓“晚明”，事实上可理解为明代晚期或明代后（末）期，那么理应有一个早期（前期、初期）和中期与之相对照。然而，即便是从本论题的视角，本书也无意按照早期（前期、初期）、中期、晚期（后期、末期）的顺序划分明代历史。之所以用晚明表述研究的时段，是因为本书试图展现和勾勒的历史图景的主体大致出现于被学界习惯地称为明代晚期（后期、末期）的历史阶段。这样的解释似乎不能尽如人意，因而具体界定这一研究时段的范围及说明历史赋予这一时段的特殊的研究意义就显得十分必要了。

本书的研究以社会经济的商品化趋势为背景而展开，商品经济的新发展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是研究时段的起点。这一历史现象的出现，从资料出发进行判断，最可能的是在嘉靖、万历年间。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其实不胜枚举，尤以顾炎武关于徽州地区社会风土变化的描述为典型：

于时（弘治年间——作者注）家给人足，
居则有室，佃则有田，薪则有山，艺则有圃，催